本文对于研究中国皇权制度在元朝权势变化，并进而影响明朝的过程颇有启发。作者首先讨论了元朝皇帝所具有的双重身份，既是汉制下的皇帝，又是蒙制下的大汗。贯穿有元一代，一直使用双重符号体系来表明统治合法性，包括蒙汉并行的国号、庙号、纪年形式、两种官方语两种即位仪式和祭祀仪式等。

而在实际的政治制度上，作者考察了与皇权相关的怯薛制，以及蒙古旧俗中“主奴关系”对皇权的影响。后者使得元人将大汗-皇帝和臣僚们的关系，看作与使长和奴婢相似的关系。主奴观念的泛化，较之宋代士大夫与皇帝的“共治”远远要野蛮，也表现得更为专制。作者姚大力特以君主对于士大夫的人格尊重与否来举例：

可是到了元代，大臣竟可以由皇帝下令在朝堂上受批颊。 朝臣受杖之事在现存史料中虽然不多见， 但看来人们对此亦颇已习以为常，再也没有什么异议了。

作者也以为，廷杖的流行始于金，并赞同吴晗的观点“明朝的‘廷杖’是从元朝学来的”。虽然直接的史料证据不多，但也部分印证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导言中的结论。

作者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先回顾了元以前的中国专制皇权的演变，再进一步考察元朝蒙元时期对皇权的影响。对宋代皇权的看法，作者归纳了前人的三种意见：一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主导说法，以为宋代是专制君主的中央集权制获得极大加强的时期，制度化的权力分 割使君权比过去得到进一步的伸张；二是王瑞来的观点，他认为宋朝官僚政治体现了“从皇帝独裁到群臣专政”，或曰“皇权象征化和作为集体领导的相权的强化”之趋势，两宋是“皇权全面衰微、走向象征化的开端”；最后一种是虞云国的看法，宋代官僚政治中出现了君主、台谏和宰执 “三权制衡”的局面，但最终决策者仍是专制君主，宋代整体上未改变“君主独尊”的性格。作者本人的看法近似于第一与第三种的调和，以为唐宋之间君臣尊卑名分持续呈现一种缓慢但又是确凿无疑的增强趋势。元朝“泛化的主奴关系”只是加强而非扭转上述趋势。

笔者以为此种看法并不能站得住脚，无论是认为宋代皇权“全面衰微”，抑或是认为宋代皇权较之唐代有所增强，都有所偏颇，而后者尤其如此，因其完全不能解释为何“士大夫共治天下”只能出现在宋代而不能出现在唐代，以及作者所说的两宋时期曾经相当有力的臣下制衡君主权威的制度性安排和惯行体例。而至于一些方面来看，宋朝君臣名分反有所加强，这可以用“历史的螺旋上升”来作简单的解释。笔者以为，关于宋代皇权比较中肯的看法应当是王瑞来与虞云国看法的综合，宋代的皇权虽不至于“全面衰微”之地步，但已然有了可见的“虚君”趋势，元朝将这一方向逆转，促使了明代专制皇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高峰。